

人类精神的对话：《哥本哈根》

吕效平

—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且“极端地”说，无论我们的国家组织怎样健全，无论我们的伦理体系怎样完善，无论我们的法律制度怎样缜密，所有这些，都不能把我们将与由一只雄壮的公鸡率领着在垃圾堆上刨食的鸡群区别开来。

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只小鸡停下爪子，看着身边奋力刨食的同伴，想起它那刚刚被主人捉去宰杀了的母亲，思索着：我们这样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落在这只垃圾堆上是纯属偶然，还是由于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意志？在我来到这个供养我们家族的美丽高山之前，远方的太阳升起有多少回了？在我像母亲一样被宰杀之后，它还会升起多少回？太阳照耀下的我们的家园是多么美丽啊！这样一来，这只鸡就具有了神性，就与垃圾堆上的它的同类有了本质的区别。

人之所以为人，不是由于我们在实践性活动中形成了怎样复杂而有效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不是由于我们在实践性活动中表现出了怎样伟大的能力，而是由于我们能够观照我们全部的实践性活动，观照我们在实践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

我把这种观照称为“精神”的活动。

这种观照，不属于实践性的世界，不以功利为目的。它有时候甚至妨害人在实践性世界的功利行为。比如哈姆雷特的智慧、他的深刻思索，使他意识到：

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
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这样一来，他的复仇的责任便成了他的实践性世界中的一个十分有限的目标。比较起来，奥菲利娅的哥哥雷欧提斯和“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

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的挪威老王的侄儿福丁布拉斯，他们不做哈姆雷特似的思索，更能够迅速地担负起他们在实践性世界的责任。哈姆雷特，是人类“精神”的化身，是一个由艺术创造的极端。

但是，有没有这种精神的活动，对于人类全体或个体都是十分要紧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全靠这点“神性”。丢弃了这个“神性”我们或者全体、或者个体就只能属于愚钝的动物界的成员。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当年拼着性命去完成的复仇的使命，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毫无疑义了，但是哈姆雷特却以其精神的光辉，驱散了一代又一代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灵魂的黑暗，点亮了人的“神性”。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我们应当把“酒神”的品格与“日神”的品格结合起来才好做人。他所谓“酒神”的品格，就是在实践性的世界如痴如醉地勇猛追求的行动的品格，他所谓“日神”品格，就是像太阳神阿波罗一样高居于实践性世界之上，把全部实践性世界作为自己观赏对象的智慧的品格。

人类的“日神”品格，或者说，我们的精神，集中地表现在我们哲学的、宗教的和艺术的思维活动中。

哲学、宗教和艺术，其方式和途径不同，但其对象却都是一样的，就是被无功利目的地观照着的全部实践性世界。它们的结论或感受也往往是相通的，不过被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因为把全部实践性世界作为自己的对象，哲学、宗教和艺术都与实践性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一部圣经或一部佛经，它可能同时是识字课本，是历史纪录，是政治策略大全，是伦理戒律，是社会组织法，是最原始的法规……但是，有太多的历史、政治、伦理、社会、法律的记载并不能成为哲学的、宗教的或艺术的“经”典，就因为它们在实践性世界的功利考虑之上，不能对实践性世界做非功利的整体观照，缺乏“精神”的光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实践性的世界成了帮助妇女解放的有力的宣传甚至思想的武器，为此挪威“保卫妇女权力协会”给予该剧作者极高的荣誉。而易卜生却辩解说：“我主要是个诗人，而不是社会哲学家……我不应当接受自觉促进妇女运动的荣誉。我甚至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它（妇女协会）的实质。”《雷雨》被当成社会批判的武器时，曹禺也说过同样的话。艺术一旦充分地实现了它作为精神产品的本质，便获得了征服人心的无穷魅力。

于是，实践的世界便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当作工具使用。但是，无论它在实践性世界里怎样有用，我们都不能忘记了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精神产品本质。

可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古便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倾向，其精神的光彩比较淡薄。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主要地，是对实践性世界进行的功利考虑。作为它精神缺失的补充的，是这个思想体系之外的道家学说。因此，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一旦传入中国，立刻被强烈地实用主义化。走进中国的佛教寺院或基督教堂，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喜剧的氛围。在那里，你往往会发现与释迦牟尼和基督耶稣素无瓜葛的赵公元帅、送子娘娘和驱邪赶鬼的关公，人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进行精神活动，并不关注自己的灵魂，并不关注“彼岸”世界，人们关注的是今生或来生的富贵、健康、多子多福。因此，你往往感觉，我们的宗教场所，其实是一个虚拟的商品市场，人们以这个虚拟世界的纸币，来贿赂神灵，购买功利。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戏剧的命运也与宗教一样。虽然最杰出的戏剧家，例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都是从精神的高度观照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是总有一股极大的力量，要把戏剧纳入实践性的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有用的方面。在最好的境况之下，戏剧也仍然被当作道德的奴婢，是伦理教化的工具。次好的情况下，则是国家意志的奴婢，是政策宣传的工具。而最近的情况，则往往是换取乌纱、梅花、若干个“一”的“纸钱”。典型的例子，就是江泽君先生生前根据曹禺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为宣传民族团结政策而创作的《王昭君》改编的同名京剧，被江苏省文化部门换以扬剧演出的行为。在扬剧《王昭君》被隆重推出的时候，当时还比较年轻的诗人邓海南创作了一个剧本，叫《梅花情结》，描写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富裕的华人妇女，因为思念40年前的初恋，回到国内苦苦等待或许并不存在恋人，直至悄然逝去的动人故事。这个戏并不像《哥本哈根》这样思索如此宏大和沉重的问题，它是一部小戏，但是，它和《哥本哈根》一样，不是为实践性世界的功利而写作的，而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声无奈的、轻轻的叹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剧坛这种不为功利而作的精神产品太少、太少了。当时，南京的剧团正忙着演出《徐洪刚》、《孔繁森》和描写反贪英雄曹克明的《大江奔流》。《梅花情结》只好由一个资产者赞助，而南京大学提供了演出场所（逸夫馆），上演了这个戏。

但是，审查这个戏是否有资格参加江苏省第二届戏剧节的文化官员们，在看完了演出之后，以一言未发否决了她的参演资格。我至今不大明白，以戏剧生产为职业的公务员们为什么没有被这个把许多南大师生感动得潸然泪下的戏所打动。我以两个猜想解释他们。较为尖刻的一个是：他们像商人一样，是来购买标志政绩的商品的，而该剧涉及精神，不属于他们需要的商品。较为厚道的一个是：知识结构问题——他们从来以为戏剧是实践性世界的工具，而这个戏越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属于精神的世界。关于后一个解释，我是有根据的。领队审查的副厅长喜欢这样恭维董健老师：“我是读你的文章懂得戏剧的。”推算起来，这位先生接受戏剧“启蒙”的时候，董老师还沉浸在“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理想里，尚未回归“五四”启蒙的立场，正在写作颂扬“样板戏”的文章。如果送他一本醒悟了以后的董老师的《戏剧与时代》，不知能否改变一下他们的知识结构？

厦门大学的戏剧学教授郑尚宪原来是江苏省文化部门的一个公务员，在目睹戏剧遭受蹂躏的种种惨状之后，决心南飞家乡。当时他是他所服务的部门的唯一的博士，他的那顶博士帽尚属部门门庭上的装饰物。领导有意挽留，约他谈谈。他连谈也懒得谈。他灰心透了，觉得在他们手上，戏剧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

董健老师家过去养了一只肥猫，它是由高小方教授亲手阉割的。山东人把阉割称为“敲”。董老师喜欢拿这只猫作比，说无论“乌托邦”的实用主义，还是市侩的实用主义，都要把戏剧“敲”掉，即割掉戏剧艺术精神创造的睾丸，使它安居于实践性的世界中，作什么什么的工具。

其实被实用主义“敲”掉的何止戏剧。在实践性世界范围内也有被“敲”的：司法本来是以社会公正为最高原则的，可是我的一位在检察院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学，被教育得口口声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把保障“经济发展”当成了司法的最高原则。而最严重之“敲”，还是在教育。教育的最高原则，应当是培养既能够在实践性的世界勇猛追求，又能够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观照整个实践性世界的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但是，我们的许多教育官员、校长和老师仅仅懂得培养服从伦理、遵守纪律、能够创造财富的有用“人才”。

“人”与“人才”之别，就是“猫”与“阉猫”之别。

“实用主义”啊，你是杀“人”的刽子手！我视你为死敌！

还是谈戏剧吧。

对个人来说，你要创作戏剧的话，对整个社会来说，如果要发展、繁荣戏剧的话当前的第一要义是重新给戏剧定位。用曹禺的话说：戏剧

“是一首诗，……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

戏剧把全部的人类实践性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行非功利的观照。她属于精神的世界，与全部的实践性世界相对峙。

工具的作用，只是戏剧的副产品。任何把戏剧纳入实践性世界的实用主义都是对戏剧的精神本质的阉割。伦理道德没有这个权利，政治理想也没有这个权利（如《93年》所证实的），法律、税务、计划生育……当然更没有这个权利。《93年》和《哥本哈根》昭示我们，什么是“精神的对话”、精神的产品，什么是戏剧的本质。

而《哥本哈根》做得更好一些。

1941年，丹麦陷入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领导德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他拜访了自己的导师和精神上的“教父”——丹麦著名物理学家波尔。海森堡饭后邀波尔出外散步，也许是为了这样谈话可以避开纳粹的窃听。但是，这次户外的谈话仅仅持续了10分钟。归来时，两个人都很激动。从此这两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便不再有接触。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他们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谜。



玛格瑞特（波尔的妻子）：……他们说谈一小时，就意味着两小时，当然也许会三小时……本世纪许多物理学的新思想就在他们的野外交谈中形成。……但这一次，1941 年，他俩散步走着一条不同的路。离去 10 分钟后……他们回来了！尼尔斯（波尔）站在门口时我几乎餐桌还未收拾好，我立刻发现他们是何等的气愤——他无法直视我。

波尔：海森堡来告别的，他要走了。

玛格瑞特：他也回避与我直视。

海森堡：谢谢你，一个快乐的晚上，就像当年一样。辛苦你了。

玛格瑞特：喝点咖啡吗？来一杯什么？

海森堡：我得回去准备明天的讲座了。

玛格瑞特：你走之前还会来看我们吗？

波尔：他有好多事呢！

《哥本哈根》让死去多年的波尔、海森堡，还有玛格丽特的灵魂在一起，讨论 1941 年的那个谜：海森堡究竟为什么来哥本哈根与波尔见面，他对他究竟说了什么？



波尔：你是知道同盟国的科学家们为何研究原子弹的。

海森堡：当然。是恐惧。

波尔：同折磨你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害怕，你也在研究。

海森堡：但，波尔，你本该告诉他们的！

波尔：告诉他们什么？

海森堡：我在 1941 年告诉过你的！选择在我们手中！那就是，既然我能在他们（当局）询问时，回以简单的实情，简单的，令其失望的实情，他也能够！

波尔：这就是你要我做的？不告诉你美国人在做什么，只是让他们停下来？

海森堡：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起停下来。

但是，无论海森堡在德国领导的研究，还是波尔参与的在美国的研究都没有停下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当天晚上，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



玛格丽特：在尼尔斯去之前，事情早就决定。不管他去否，原子弹总是会造出的。

波尔：如论从哪方而言，我的作用都是很小的。

海森堡：奥本海默说你是研究小组的父亲兼神父。

波尔：这似乎是我的终身角色。

海森堡：他说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波尔：可能是精神上，不是技术上。

海森堡：弗密说长崎那颗炸弹的引信是你研制的。

波尔：提出过一个想法。

玛格丽特：你不是在暗示尼尔斯该为什么做解释或辩护吧？

海森堡：没有人要求他解释或辩护。他是个厚道的善良人。

波尔：善良是毫无疑问的。我与决策无关。

海森堡：是的，而我却不行。我在不断的解释和自辩中度过了我生命的后 30 年。1949 年，当我去美国时，许多物理学家居然都不屑与我握手。那些造过原子弹的手不愿碰我的手。

“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大潮泛滥吞噬了我们所有的人。”



波尔：每每想起这我就心碎。

海森堡：它令所有的人心碎。

玛格瑞特：而这种神奇的机器可能会杀尽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我们真是宇宙的中心，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了这种武器，留给世界的将会是什么？

波尔：黑暗，绝对的和终极的黑暗。

玛格瑞特：困扰我们的这些问题将最终不复存在，连鬼魂也将死去。

《哥本哈根》触及到人类实践性世界里的一个深刻的问题：科学伦理的问题。科学家究竟有没有权利研制核武器？为纳粹工作但并没有制造出原子弹杀人的海森堡和为战争中正义一方制造出了原子弹，轰炸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奥本海默和波尔，谁更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如果作者试图在这个实践性世界的问题上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剧便落入了关于科学伦理的实践性世界。无论是谴责海森堡的为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为广岛、长崎的轰炸辩护，还是用“已经”犯罪与“尚未”犯罪把奥本海默、波尔与海森堡区分开来，谴责事实上发生了的屠杀，都是在伦理上做功利的、实用的考虑。作为艺术，《哥本哈根》超越了伦理，它在考虑了伦理的全部理由之后，表现了伦理的困惑。

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儿女遭受帝国和威胁的时候，他有没有权利，用核手段保护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和儿女？



海森堡：波尔，我必须知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该为我们国家做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容易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恰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导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再让伴随我长大的恶梦重现吗？波尔，我的童年是在慕尼黑兵荒马乱的内战中终结的。还要更多的孩子像我们那样挨饿吗？还要他们再过我的学生时代那样的夜晚吗？在寒冷的冬夜，手膝匍匐地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大雪与夜幕的掩护下去乡间为全家找吃的？还要像我 17 岁那年，守着那恐怖的犯人，跟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凌晨，因为明天他就要被处决了？还要他们像我那样整夜地煎熬吗？

如果说，处于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科学家可以这样为核武器的研制辩护，处于正义的一方不是更有辩护的理由了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人类而拥有核武器，人类把屠杀发展到这样惊人的科学高度，这是人类的耻辱！但是，当美国和苏联用几百、上千颗核弹头瞄准我的祖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科学家，是发展核武器，保护自己的祖国、母亲与妻儿道德呢，还是放弃自己的责任，以“道德的完美”为理由，放弃发展核武器更为道德？

《哥本哈根》不是论证了科学的伦理，而是表现了伦理的尴尬和困惑！

实践性世界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都是有限的和荒谬的，不能最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哥本哈根》就是描写了人的这种困境。

艺术不同于哲学。它不是赤裸的理念。他描写人，人的情感。戏剧，就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哥本哈根》描写科学家在这种两难的道德困境中，被撕裂了的灵魂。和郭文应不应该放走朗德瑞克的道德两难的困境一样，和西穆而登应该不应该判处郭文的死刑的道德两难的困境一样，无论参与或不

参与核武器的研制，海森堡和波尔都会深陷在道德的自我谴责与辩护之中。通过他们的这种被自我的道德谴责与辩护撕裂了的痛苦的灵魂，《哥本哈根》观照了人类卑微的处境和崇高的心灵。

人的卑微，其实并不特别地由于我们的短暂和渺小，而是特别地由于我们的无法摆脱的荒谬。

察觉我们的荒谬，是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体现。是哈姆雷特高于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地方。

《哥本哈根》的诗意还不止于此，不止于描写了人类的道德困境。它还描写了人类认知的困境：我们永远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本质。这种认识自己的渴望和这一渴望的不可能满足同样撕裂了剧中人物的灵魂。

海森堡和波尔 1941 年的那次 10 分钟的会谈，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悬念，而且在剧中，它成了当事人自己心灵的巨大悬念。他们一次次地尝试解释自己，但是他们越解释，距离认识自己越远。他们越是焦虑地试图认识自己，越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甚至连 1941 年那次户外谈话的时间与地点也搞不清楚。直到剧终，三个人物还在围着这个悬念，不得要领地痛苦地打转转。

而且，无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和当事人自己都不明白：波尔夫妇和海森堡是相互仇恨呢，还是相互关爱。

虽然身处两个敌对的国家，他们还是陷入了旧日温暖的友情：



波尔：美丽的夏日，花园里飘来阵阵玫瑰的清香。大厅中座无虚席，一排排地坐满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人们都点头赞许着我的道义和学问。突然，跳出一个毛头小伙子，指出我的数学计算是错的。

海森堡：计算是错误的。

波尔：那时你多大？

海森堡：20。

波尔：比世纪还年轻两岁。

海森堡：不到两岁。

波尔：12月5日出生，对吗？

海森堡：比世纪年轻1.93岁。

波尔：精确数。

海森堡：不，保留两位小数点。精确数为1.9287671……

波尔：关于你的一切我总是记得很牢，你是比世纪年轻两岁。

玛格瑞特：事已至此，尼尔斯又突然喜欢起他来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哥廷根的那个夏日的回忆吗？还是为这一切？或是什么也不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坐下来用晚餐时，熄灭的灰烬又燃起了火焰。

这一温暖的回忆是真实的吗？

真相的另一面是，他们一致在互相伤害着。

“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何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你是来向我们炫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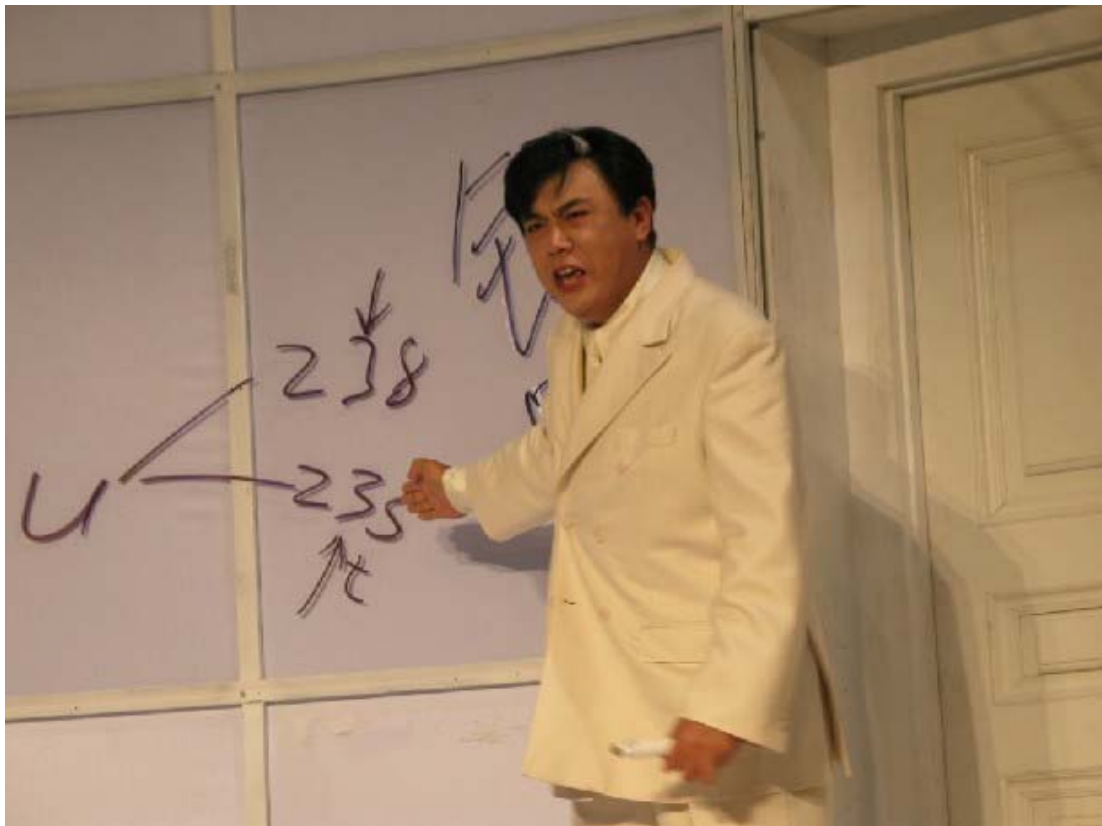
玛格瑞特：没错！1924 年他刚来时，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卑微的小助教，感激不尽地获得一份差事。现在你来了，凯旋而归——一个征服了欧洲大部的泱泱大国的科学界领袖。你来向我们炫耀你是如何功成名就的。……

玛格瑞特：他渴望着让我们知道他正负责某项生死攸关的秘密研究。尽管那样，他依然保持着高傲的道德独立，这种执着是如此著名以致盖世太保时刻监视着他。这种执着是如此成功以致今日还拥有一个重大之极的道德困境来面对。

不仅自我因其不可认识而显得荒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因其不可认识而显得荒谬。

这个荒谬的世界是偶然的，无理性的。波尔的长子克里斯汀死于偶然；海森堡的婚姻也属于不可解释的偶然，纳粹德国最终未来得及研制出原子弹，居然不是因为实质性的难题，而是因为一个完全应该克服的小小的偶然疏忽……

“你是没有（制造出原子弹）……原因极简单，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



海森堡：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告诉别人。……

海森堡：在（广岛爆炸）事件发生后。是的，当它已不再重要。我说了所有高德斯密说我不懂的东西。235 中的快中子，钚的选择，减少中心泄漏的反射外壳。甚至引爆的方式。

“我们”是什么？



波尔：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束了。

海森堡：我们还未能看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便去了，躺入了尘土。

波尔：淹没在我们扬起的尘土之中。

玛格丽特：那时会迟早到来，当我们所有的孩子化为灰土，我们所有孩子的孩子。

波尔：那时，不再需要抉择，无论大小。也不再有测不准原理，因为那时已不再有知识。

玛格丽特：当所有的眼睛都合上，甚至所有的鬼魂都离去，我们亲爱的世界还会剩下什么？我们那已毁灭的，耻辱的而又亲爱的世界？

海森堡：但就在那时，就在最为珍贵的那时，它还在。裴拉德公园的树林，加默廷根，比伯拉克和曼明根。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哥本哈根》燃起了两把火：一把“道德困境”之火，一把“认知困境”之火，把波尔夫妇和海森堡的灵魂架在火上慢慢烤，让我们旁观了他们的欢乐

与悲苦、宽爱与嫉恨、恐惧与怜悯、温情与疯狂、期待与绝望……这是一首真正的诗！

郭文和西穆而登的心灵困境是古典的，波尔和海森堡的心灵困境是现代的。《93年》的精神是古典的浪漫主义，《哥本哈根》的精神是现代主义的。但它们都是人类“神性”的表现；是艺术家站在精神世界的立场，与实践性世界的对峙；是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超越功利的艺术观照。

这应当是《93年》与《哥本哈根》给予沉溺于实用主义泥坑的当代中国戏剧的最大的提醒。

董老师在观看的座谈上讲话



博士生蒋泽金发言



博士生胡静发言



廈門大學圖書館